

# 文化选择与生态危机

杜 薇<sup>1</sup>, 尹绍亭<sup>2</sup>

(1. 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2. 云南大学 人类学博物馆,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生物学与文化人类学相互借用、交替推进, 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中引进进化论具有不完备性, 为了实现生物学与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兼容, 需要在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基础上引进文化选择和文化选择歧化这两个概念以满足生态人类学理论分析的需要, 也才能明辨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生态灾变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 文化选择; 自然选择; 文化选择歧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7)02-0073-06

**作者简介:** 杜 薇(1973-), 女, 贵州印江人, 副教授, 2005 级博士研究生。

尹绍亭(1949-), 男, 贵州腾冲人, 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化作为人得以区别于其它生物物种的本质特征, 是一个人为的信息系统。这个人为信息系统不仅要处理来自地球生命体系的各种反馈, 还必须应对人类社会各个不同文化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这种状况使得文化同时具有了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意义上, 文化的这两个属性与人类同时兼有社会性和生物性相协调。但在人类被文化分割为一个个迥异的民族群体的层次, 文化的社会属性被理解为那些促使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得以组织起来的具体文化事项和抽象的文化逻辑。文化的自然属性也在这里与人类的生物性拉开了距离。人类一致的生物性要求却不得不通过文化来实现, 正是在这个环节, 为了与千姿百态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契合, 各文化子系统的自然属性也多姿多彩, 由此实现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大面积分布。对于按照不同文化逻辑运作的不同人类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 现有的社会科学从发展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作了不同的尝试, 但终究难逃欧洲中心主义的制约。对于文化的自然属性内部呈现的差异性, 文化人类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却一直缺乏对自然属性共性的综合。更关键的是, 忽视了文化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多重交互影响的运行特点。文化选择概念的引入, 就是一个力图弥补这一缺陷的尝试, 试图将这两种属性融为一体。

## 一、文化人类学史对“文化选择”的长期漠视

1859 年, 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 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 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的线性模型, 即变异——自然选择——优势积累——能适应的新物种诞生。在他看来, 一切生物物种在其有性繁殖中都会自然地发生变异, 但这样的变异对该

\* 收稿日期: 2007-03-04

种生物的生存而言,不一定意味着具有优势。仅是一种纯客观的变化,然而,自然选择是无情的,自然选择能够把那些不适应的变异淘汰掉,留下那些具有优势的变异结果。于是,这样的自然选择只要稳定地持续下去,就会导致具有适应优势的变异得到不断地积累,终至于形成一个具有更强适应能力的新物种来。

19世纪中叶的文化人类学家,不仅为达尔文的上述见解震撼,而且注意到了文化的多元并存,文化的可变性与生命世界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因而毫不犹豫地引进了达尔文的上述见解去解释文化的演化和进化的规律。然而不同的文化与生物物种相比毕竟不是一回事,引进达尔文的上述见解必然得做某种意义上的消化、吸收和改制。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的变异是自然发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文化人类学家却必须承认,荷载文化的人具有智慧,具有能动性,于是,文化的变异就不是纯客观发生的事情了,而应当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应当是人类具有能动性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定:人类具有共同的心理,正是这种共同的心理支配着文化的变异。不管是摩尔根还是泰勒,都把人类的创造性提高到了文化变异的首要地位,试看摩尔根构拟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划分指标,无一不充满了对人类创造力的肯定。既然如此,文化“变异”优势的积累当然不需要自然选择去发挥作用了。因为人类自己就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他清晰地知道什么样的变异是优势,什么样的变异是错误,他自己就可以能动选择了。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达尔文的原创思想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以至于接下去的逻辑推理就会与达尔文的原创思想越走越远。优势变异的积累,既然不需要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就只能仰仗人类的理性裁断,而理性裁断的结果肯定与最佳适应的成果相吻合,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后期的文化,它就肯定是适应的典范,肯定是进化的顶峰。思想方法走到了这样的极端,在达尔文看来至关重要的适应概念在文化人类学中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类学家,不管是摩尔根还是后来的弗雷泽,都忽略适应这一概念,或者仅是把适应理解为对付某种客观社会需要的临时手段也就不言而喻了。就事实而言,早期文化人类学家虽然高举进化论的旗帜,但他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引进仅是一个躯壳,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精髓,全部被偷

换成了人类共有的“理性”。

在以后的文化人类学发展中,不容回避的事实正好在于,随着民族志资料的积累,后继者清醒地注意到,并存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从任何共有的人类“理性”出发,都无法解释上述差异的成因。致使后期的文化人类学家不得不在进化框架之外去找寻新的解释,莫斯对爱斯基摩人的研究引入了自然因素的作用以及当地文化对自然因素的适应,在这项研究中,被经典进化论所忽视的自然选择在无意当中进入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此同时,达尔文的经典命题却被搁置起来,原因在于,在自然选择和人类理性之间,无法找到可以相互沟通的机制。将人类理性屈从于环境,或者说屈从于自然选择,那么人类智慧的特异性和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就会变得黯然失色,这是莫斯、列维-布留尔都不愿意正面承认的理念,这正是他们不愿正面引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也尽力少谈文化进化的原因。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列维·布留尔一定要在野蛮人和现代人之间划上一道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以便摆脱达尔文进化理念的困扰。

马林诺夫斯基摆脱困扰的手段堪称果断,他干脆丢掉了文化进化的念头,主张在可以亲身感知的共时态背景中去重塑人类“理性”的权威。在文化要素的结构功能中彰显了人类智慧的完善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功。在他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的12部著作中,自然界客观的限制性因素几乎全部被这些野蛮人逐一征服,从而形成了一套无所不能的文化,也就是完全适应了环境的文化。人类的智慧既然在野蛮人都无可挑剔,对于文明人来说就更加无庸赘言了。在他看来,只要有了功能分析,再讨论适应,纯属多余,再讨论自然选择则是玷污了人类的灵性。

20世纪中期,后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不仅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也催生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新进化论。自然选择的客观存在重新纳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从克鲁伯引发的话题,在斯图尔德眼中定型为对文化的终极制约因素,这无疑在文化的演化中给自然选择腾出了容身之地。然而,文化人类学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远远落后于生命科学的进程了。与此同时,后达尔文主义重塑的“灾变学说”和“大进化与小进化并存说”已经彻底改写了达尔文观念中的自然选择命题。达尔文理解的自然选择是一种抽象存在的稳定机制,而后达尔文主义理解的外在机制,已经引进了波动、风险、灾变等等丰

富的实际内容。不管是斯图尔德还是内廷,都无法追上生命科学的发展进程,在他们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环境因素波动的客观存在,看不到灾变对文化演进的推动作用。因而也就看不到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这样的难题只是到了20世纪末才被生态人类学清醒地意识到。

回顾文化人类学前辈们围绕达尔文的原创理念的探索,我们应当醒悟,长期以来将文化人类学家区分为进化论者和反进化论者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任何一个清醒的文化人类学家都不会反对文化会演变,不会否认演变的后果会变得更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延续的需要。他们之所以放弃、搁置或者修改达尔文原创理念中的某些术语,其实质在于要在人类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寻求结合点。而这样的结合点直接关系到对文化本身的认识,作为一种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序存在方式,文化与生命应当是相近的。但文化的存在形式显然高于生命的存在。因而文化形态与生命形态的兼容肯定是一个跨层次的兼容。而跨层次的兼容必须从具体的交汇点出发,为此,我们还得回到达尔文的原创命题,针对这个原创命题中的具体术语作内涵的扩充,使之能够在两个层次之间相互兼容。这里,仅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为例,展开这样的内涵扩充。

## 二、从自然选择到文化选择

自然选择应当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概念。自然背景可以用不同的指标、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内容对生物物种的定型造成千姿百态的影响。这样的复合性前人并非没有认识到。但困难在于,要把这样的复合性表述清楚,同时又使自己的立论足以说服人,那么,不仅对前人,对今天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居维叶和达尔文都的借助具体的物证去证明自己的学说。但达尔文巧妙地化解了这种复杂性,把自然选择理解为一种定向的模塑作用,从而使自己的原创命题赢得了普遍的赞同,左右了人类的思想接近一个世纪。换句话说,达尔文笔下的自然选择仅是自然选择丰富的内涵中一个极其有限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生物物种所面对的自然背景仅限于小幅震荡并能准周期重现的特定范围内。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选择对物种的模塑作用在地球表面的世界中几乎是俯拾即是,以至于达尔文通过他的环球旅行就能收集到足以说服世人的充要证据。整本《物种起源》

所探讨的生物适应几乎全部属于这一范畴的内容。自然背景在长时段内非规律出现的大幅震荡,甚至是突发的灾变,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事实上是有意识地避开了这一客观事实,但却被后达尔文主义明确地重新提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后达尔文主义是用居维叶所持的证据去修订达尔文的褊狭。据此可知,自然选择的内涵还必须考虑到自然环境的非规律性灾变和非规律性震荡。因为这样的环境变动对新物种的形成更具决定意义,对生物适应能力的提高作用更明显。此外,生物的客观存在必然建构起另一类自然环境,即有生命的自然环境,这样的自然环境同样会对生物物种发挥选择作用,同样可以模塑出新的生物物种来。20世纪中期的生物学研究注意到了生物之间的协同进化,注意到了生物群落可以形成小生境,也会模塑出一些只能在这种小生境中存活的生物物种来,从生命形态的层面丰富了自然选择的内涵,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理由说人类对自然选择的内涵已经全部掌握了。这是因为,对人类的研究而言,客观存在着很多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尽管扩大了人的研究视野,但这种扩大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两个纬度都无法延伸到可以将地球生命现象囊括无遗的程度。举例说,对古代生物的研究就得靠偶然的地质发现,靠生物的化石作猜测。

对文化而言,自然选择同样要发挥作用,因为荷载文化的人也是一个生物物种,但这样的模塑作用,其层次更其复杂化。自然的无机背景有模塑作用,生态系统也会发挥更直接的模塑作用,人类建构的社会还会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事实上都是被包围在上述三重环境中去进行选择,有争议之处仅在于,人造的社会环境不应视为自然环境。文化人类学的前辈们对此的立场十分坚定,社会背景是人类特有的背景,因而不容许将它视为自然环境。本文将沿用前辈们的立场将人类自身构建的社会作为人类需要适应的特定背景之一,把它总称为社会背景。与此同时,对无机自然和地球生命体系也作了对应的处理,将它们合并起来,总称为自然环境。于是,得出了文化生存必须面对的双重环境,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两种环境对文化的模塑作用相当于后达尔文主义理解的自然选择对生物的模塑作用。只有经过这样的扩充,现代生命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有效结合才可望实现,自然选择这一概念才可望兼用于文化与生命系统。由自然选择衍生出来的人工

选择也才有可能赋予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内涵。

按照达尔文的理解,新物种的形成,新的适应能力的获得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限时段的观察收集到的资料根本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对这一难点,达尔文十分清醒,因而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不是以自然选择开篇,而是以人工选择开头。原因在于,人类行为的有意识性和能动性可以大大地缩短选择的过程,能够在较短的时段内观察到选择的后果,以便凭借这样的后果使他的学说获得更强的说服力。遗憾的是,达尔文在他的著作里面对人工选择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对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的区别,特别是人的智力和人的行为在这种区别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没有作出清晰的说明。这就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达尔文列举的人工选择实例,全部停留在种以下的层面内,人工选择可不可能造就一个新种,一个新属或者一个新科,达尔文的著作回避了这一内容。致使后人从他的著作出发,有理由相信更大的生物类群还得靠自然选择去塑造,人工选择无能为力。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在人工选择的背景下,新的亚种,新的品种可以与旧的亚种,旧的品种同时并存,既可以在人工背景下并存,又可以在人工背景和野生背景下并存。然而,如果按照优胜劣汰的命题,这种并存只能被理解为非正常现象。新亚种和新品种如果具有适应优势,旧品种就应当被淘汰,但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却没有明确地提到这种淘汰。不会被淘汰的理由又是什么?但就人工选择这一概念而言,永远也说不清楚。这就意味着,达尔文提出的人工选择同样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其复杂与丰富程度并不亚于自然选择。为此,对达尔文的人工选择同样需要进行内涵的扩充。

文化人类学家由于致力于文化的研究,因而早就注意到了人类社会也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多样化并存的天地。每一个社会人必然归属于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个人,其行为、尚好、价值判断又会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特定生物物种上,肯定会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要求去发挥选择作用。其结果肯定会导致各不相同的新品种问世,其实这是一个世人已经司空见惯的常识。达尔文无视文化的客观存在有他的充分理由,因为他研究的是生物而不是人类,但生态人类学却不同,既然要研究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演进,对人工选择就必须赋予新的内涵,使其能兼用于人类社会与生

命世界。为此,必须引入文化选择替代达尔文所说的人工选择,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行文表述的需要,而且在于,文化选择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又长期被人们忽略的事实。人类一直在按照不同的文化对生物物种的定型发挥着模塑作用。这种模塑作用的实质在于,人类凭借不同的文化可以能动地在自然环境中按照文化的要求能动地建构一个个新的人造环境,也就是专属于一个个不同民族的人为生境,这样的人为生境一旦能够稳态延续,它就会像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那样去汰选生物变异的后果,引导生物适应的取向,最终定型出新的品种或物种来。为此,对文化选择的定义还得立足于我们对自然选择的新认识,局部地赋予生物物种生存背景的文化内涵。按照上述理解,文化选择是指人类在不同文化的规约下,能够建构起稳态延续的民族生境,生活在民族生境中的生物物种会在文化的干预下积累其变异,诱导新品种或新物种的定型。

### 三、文化选择的歧化与生态危机

文化选择并不强调人类意识和人类目的对生物物种的选择作用,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干预下,新生物物种的定型既可能是人类有意识的结果,也可能是人类社会无意识的结果,甚至是人类社会反对的结果。达尔文只看到了人类的好奇导致了球胸鸽和扇尾鸽的出现,却没有强调在人类的农田锄草过程中,会在无意中模塑出新的杂草品种,这样的新品种或者新种能够成功地逃避人类的锄草操作,确保该物种在农田中的生存。稻田中的毛稗就是人类无意中模塑出来的杂草新品种。毛稗虽然在今天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除草剂消灭掉,但后果却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做会进而选育出具有抗药性的杂草来。有鉴于此,文化选择应当是一种超出人类理性的选择,而不完全是人类理性的选择。文化选择的后果应当和自然选择的后果一样,其结果不会服从人类的理性。获得这样的认识至关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何以会给自己造下生态危机的陷阱。

鉴于今天人类的存在形式本身就是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并存,因而文化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也必然具有双重性。它既要服务于人类自己建构的社会,又得服务于客观存在的自然背景,包括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背景。而人类社会对所处生态系统的

耦合,自然得兼顾这两个并存的层面,这种兼顾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整体观的理解,两方面的选择作用发挥还必须融为一体,这就使得文化选择的复杂性比自然选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达尔文引入人工选择,其关注点仅限于某些物种新品种的定型,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人类的社会行为还会导致另一方面的后果,那就是对客观存在的生物物种在无意中按人类社会的需要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且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引导下去推动生物物种种群规模的消长。这是文化选择复杂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文化选择的作用下,人类认为有用的,或者是喜欢的物种,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种群飞速膨胀,而人类讨厌的动物,种群规模则通过社会力量去加以抑制,然而,生态系统总是处于制衡格局之中,任何一个物种的种群规模一旦突破制衡格局,都必然诱发生态系统的重构,导致生态系统的本质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选择肯定会导致始料未及的牵连后果。这样的后果既可能有利于人类,也可能有害于人类。对有利的后果,人类可以自得其乐,而对于有害的后果,人类社会却无能为力,最终还得凭借生态系统去自我调节。因而可以说,文化选择具有鲜明的利己趋向,这样的利己趋向必然会打上非理性的烙印。只不过,立足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罢了。生物学家早就注意到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如果离开了人类营建的环境,返回纯粹的自然生态环境中,那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样的物种往往不具备起码的自我存活能力。文化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也与自然选择拉开了距离,选择的后果只能附属于人类社会,被人类社会呵护出来的新品种,某些生物物种的超大规模种群,一旦文化选择的取向偏转,都必然成为人类的牺牲品。因而,文化选择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文化选择造成的生物适应,专属于人类社会,而不属于自然。

文化选择的复杂性还与文化的本质直接关联,文化演变的速率必然快于生态系统的演化速率,更其快于无机世界的演化速率。这样的演化速率比差,会诱发生物适应的取向紊乱。在人类社会可考的历史记载中,人类对生物物种的偏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物变异积累不胜枚举。随着相关文化的式微,这些文化选择制造出来的结果,都必然随之而消失,从有限的时空域看,文化选择似乎表现得很有理智,但在大尺度的时空域内观察,文化选择

实质上是在不断地给地球生命体系制造无序。这样造成的无序最终又会障碍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土地荒漠化尽管是近年来才提到的概念,但在人类历史上,人为制造的荒漠化却古已有之。一些古人制造的荒漠化直到今天依然是人类可利用的禁区。这充分表明,文化选择导致的后果,往往会超出地球生命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对文化选择的负作用理解有欠深入,往往是生态灾变酿成的祸根。因而,要正确认识当代生态危机的成因,引入文化选择这一概念实属必不可少。

文化选择既要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需要,又不能过分地偏离自然选择,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决策。从人类的良好愿望出发,肯定会希望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社会性需要和自然性需要相互耦合。然而,这仅是人类心目中的理想,文化选择的实际运行往往会偏离这种理想。当其强化对人类社会的服侍时,必然会放松,甚至搁置对自然背景的依赖,有意无意地损害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当文化选择专注于与自然背景的兼容时,又肯定会损害人类社会的内聚能力,难以应对来自外部社会的挑战。这就导致文化选择一直是在两个服务对象之间摆动,不断地探寻新的平衡点。文化选择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围绕平衡点的左右摇摆。文化选择的对象也在这种摆动中按照人类的需要而付出或存或亡的代价。而且这样的代价不仅属于人类社会,还会波及到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是文化选择复杂性的又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导致生态隐患的根源。为了行文的方便,很有必要将文化适应的超常摆动定义为文化选择的歧化。文化选择歧化的典型表征是文化的社会性需要凌驾于自然需要之上。相关的文化共同体漠视甚至搁置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片面地追求社会整合能力和社会应变能力的提高。需要着重指出之处仅在于,文化选择的歧化在通常情况下总是被掩盖在具体文化的理性之中,使当事的人们难以觉察,只有在经历漫长的岁月磨洗后,由此而导致的生态后果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具体文化的理性出发,总是对这种歧化视而不见。从而使得生态隐患的存在总是具有隐含性和模糊性。当代的众多学科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蒙蔽而很难把握生态危机的成因,看不到生态灾变的酿成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也是文化选择的产物。有幸之处仅在于文化人类学所积累的民族志资料不仅能提供人类成功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范例,也能提供人类自毁家园的实例。成来源于文化选择,败也

来源于文化选择。

#### 四、结语

文化选择与自然选择分属不同的范畴,两者的兼容并不具有必然性,要维护这种兼容,只能仰仗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能动性。这乃是生态人类学的根本立论基础。立足于文化选择的基本特点,注意到自然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区别,对待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不应当过分地偏信自己

的理智、自己的聪明,人类文化可能创造的各种理性,在对待这样的复杂问题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能够做到在矛盾暴露后能及时地亡羊补牢也就十分理想了,如果能够意识到具体文化理性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之间业已露头的不相协调。在多元文化制衡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方可望化解生态问题,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龙先琼)

## Cultural Selec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DU Wei<sup>1</sup>, YIN Shaoting<sup>2</sup>,

(1. *Et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2. *Anthropology Museu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Biology and ethnology interact and impel one another. Ethnology, which introduces evolutionism from biology, is not complete. Two concepts, cultural selection and cultural selection divergence, are to be introduced besides natural selection and artificial selection to realize the theoretical compatibility of b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meet the demand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thnology. Only in this way can cultural cause of ecological disaster that ethnology is faced be understood.

**Key words:** cul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cultural selection divergence

---

(上接第 11 页)

## On Absolutism ( The Middle Part)

—The Origin of Autocracy

WANG Hairm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ivil slavishness, traditional custom, absolutism theories by ideologists, meritorious great leaders as well as national wills which are suitable to autocracy, are all the causes for the occurrence and existence of autocracy. However, only three causes are the roots for autocracy, i. 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single highest leader, and the human nature of the highest leader to seek the highest power. Regarding the roots and the various reasons for autocracy, autocracy is accidental, possible, and free choosing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eve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all the reasons for the autocracy exist. Autocracy is absolutely accidental, and is not absolutely and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Key words:** autocracy; absolutism;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oriental absolutism